新书架

新中国
口述史
(1949—1978)

《新中国口述史》
曲青山 高永中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口述历史、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近30年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始末，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新中国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本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主编，收录了陈锦华、王立诚、阎明复、邓力群、苏维民、李雪峰等50余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录、口述历史，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

涡河边的老子
潜读十年，独特见解。

《涡河边的老子》
许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涡河边的老子》是许辉以个人化视角感悟老子《道德经》后，十年磨一剑的呕心之作，是对《道德经》别具一格的深刻感悟。作者出生成长于淮河流域，对淮河地域文化有切身的体验、用心的揣摩和有意识的观察、归纳。他说："老庄孔孟都是淮河这一流域的经典产出，这里面一定大有深意！这也是我多年认真钻研淮河文化的动力。如何能从一枝一叶里提炼出淮河的文化精神，并使这种古老的资源有用于当代人类社会，是我要倾心而为的事情。我读《老子》，写《涡河边的老子》，不是为了研究古文，而是为了寻找思想，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为了启迪智慧，不是为了版本古音，而是为了感悟生命。"

对话王树增：

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家谱

□本报记者 张思思

"虽然我写的是历史，但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尤其是为当代青年而写。我希望青年人喜欢我的作品，如果他们喜欢，我将无上荣光。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家谱，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不然的话脚不着地。'当记者与《抗日战争》的作者王树增谈到在铭记历史方面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时，他如是说。

尼采曾在《超越善恶》中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这让记者不禁想到，当王树增形容在写作中，"像我这样强壮身体都顶不住"，甚至经医生诊断出现'过劳死'的迹象，他仍倔强地表示："我觉得总而言之是一件很苦的事，但是话说回来人活着做哪件事不苦？所以说我们干这行也不能单独说我苦到哪儿去，但是辛苦点对得起读者吧。胡编乱造绝对不行，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我自己宁可不出书。'可以说，王树增承受住了长时间写作带给自己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而他最终带给我们的，是一部非常谨慎和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

王树增曾表示很喜欢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他坦言历史上的很多小细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万历十五年》那种'写大历史从小细节开头'的写作方式，对他的写作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日，王树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他对于学习历史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在写作背后的故事。

从三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记者：您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句话？

王树增：我是认可这句话的，这种认可是在我多年研究和写作当中逐渐形成的，有三个理由支持：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当异族侵略眼看就要亡国灭种的时候，将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国凝结成一条心，是重中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做不到，他不要说凝结全国的民心和军心，就连他的军队他都统一不了。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面对强敌我们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军心和民心凝结起来，用什么手段凝结起来都不为过。共产党人作出巨大牺牲，就为了民族抗日能够走下去，帽徽都换，我在书里专门有一段写到。

第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抗战总的战略决策就是《论持久战》，我们现在读《论持久战》，依旧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战争艺术和政治智慧，他在战争初期，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个战争将要经历多少阶段，每个阶段的战争样式是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八年抗战最后每一个阶段都验证了他的话准确无误。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第三，敌后战争。没有敌后战场的话，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在牵扯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当然最后的部队也不是什么精锐部队，全是丙级兵团了，为什么呢？主力兵团也不在正面战场上，跑到缅甸和太平洋战场去了，守硫磺岛去了，但是我们牵扯他的兵力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里有记述，日军没有后方，所以说我们很难想象正面战场打成多么惨烈，如果说日军占领区能腾出兵力的话，那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在民族精神上、在战略战术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回顾抗日战争，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您曾说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您的作品和其他讲述抗战的作品不同之处在哪里？对于《抗日战争》，您曾说'我的作品就是为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而让您忧心的也是现在年轻人不了解历史。您认为在铭记历史方面，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

王树增：写作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所以也不敢说自己的书是不是标杆。我写作并没有开创什么，只是在我熟悉的领域中尝试。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作为作家，我们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那是永远都写不完的财富，所以我要尽我所能去试着将它们写出来。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只有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会知道自己到何处去。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了解民族的历史，他可能会活得自在一些，安心一些，同时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也可能会坚强一些，不会做出非常幼稚和鲁莽的举动。如果我的作品能给中国当代青年提供这样的帮助，而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和他们成为朋友，用文字和他们来谈心，并且得到他们认可，那这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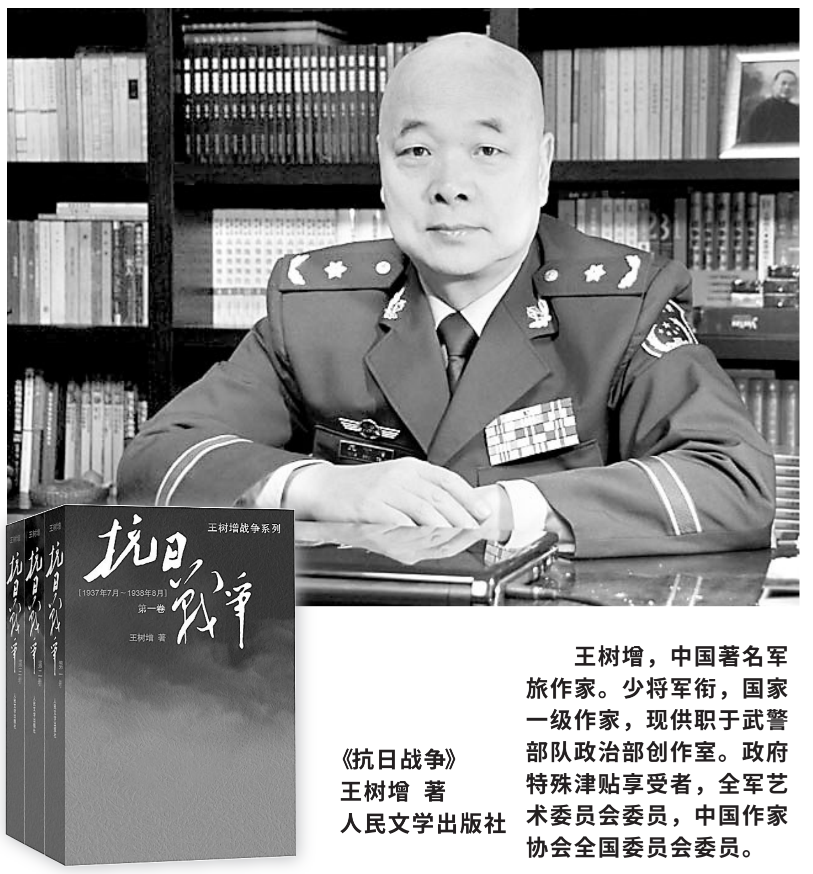
我的战争系列到《抗日战争》就已经完成了，之前写了《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为什么把《抗日战争》放在最后，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写作难度比较大，对于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资料的获取这些东西都比其他的几个题材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准备好，一直定不下来写的决心，所以放到了最后。抗日战争终究是我们战争史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它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扯的面之广远远超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我想这也是难度之一。特别是对于历史认知问题，抗日战争是当代中国战争史当中我们认知最为含糊也最有分歧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实事求是地说，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这个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提供的读物，不管是从史学的角度讲，还是从非虚构类作品的样式来讲，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都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上带来影响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题材。

所有为了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的人都不应被遗忘。我们国家设置了公祭日，我们也进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这唤起了我们对这场战争认知的渴望，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来讲，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这场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场战争的认知，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的文化过程的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些意义已经不言而喻，我觉得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我希望这部书能够让我们的读者关注到，我不会让读者失望。

历史的真实不容戏说

记者：您在写作《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历史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的，即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

王树增：我认为非虚构类作品有三个特质，第一非虚构，细节都不能虚构。我这本书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两支军队在这儿对峙，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彼此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因为下着雨，天气雾气迷蒙，但是就这句话我踌躇了很久，7月5号、6号卢沟桥是否下雨，我必须查气象。细节都必须真实。非虚构就是这个样子，书中哪怕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在书中占了一行，对这个人都必须进行考查，我绝不会在里面虚构一个王老五李老三。我前期的案头工作十分严谨，因为对自己有点苛刻。第二必须是文学，你不是写一个战史、军史，画个地图就完事了，文学是什么，要有文学的叙述风格，文学的审美特征。另外还要以人为主，而不以事为主，包括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所以从一开始叙述表情就是文学叙述表情，它的结构也是文学结构。第三你必须提供作家本人带有独特认知的历史观点和历史认知，史学家不给你干这个事，他给你列出来就完事了。我写朝鲜战争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长征也好，我的立场非常鲜明。同样的抗日战争书有几百种，读者凭什么想读老王的书？你能用你的观点引导他去读史，而且这种引导应该是带有你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三个特质形成了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特质，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写非虚构类作品无论是近代史还是战争史，我实际上是写心灵史，战史用不着我去写，有那么多专家呢。我觉得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好好地梳理我们民族的心灵。


抗日战争
王树增战争系列
[1937年7月～1938年8月]
第一卷
王树增 著

《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树增，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清风书香·党员干部谈读书

以民为天 心碑永驻

——读《习仲勋与群众路线》

□王栋栋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仲勋同志是践行这一路线臻于炉火纯青境界的开国元勋之一，就连毛泽东同志都赞誉他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编写组采用口述史的形式，访谈百余位曾经在习老身边生活、工作过的干部职工和普通群众，向读者集中展现"在群众中"工作和生活的习仲勋。显然，这一写作方法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是对习仲勋崇高的致敬。

有句话说得好：人民群众是天，共产党人是靠天吃饭的。在习仲勋光辉战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他始终视群众如天，把群众当主人服务、当亲人对待，成为了共产党人靠天吃饭的典范。习仲勋曾说，"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言为心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才会有陇东群众"习仲勋还帮我们家干过活儿、挑过水呢"的幸福回忆；才会有"农民老汉老太太的干儿子"的亲切称呼；才会有"主席背老汉"（有一次出门办事，习仲勋同志看见一个生病老汉坐在路边，就执意背他去了医院，后来那个老汉才知道，背他的这个年轻后生，就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佳话……习仲勋是真正做到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继承和弘扬习仲勋宝贵的政治遗产，就必须像他那样弯下腰来，把群众立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全力造福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仲勋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今天都不过时："我们许多同志，往往事与愿违，他的心肠是很好的，但是一去了群众就反对，不拥护他，因为他只有群众观点，而没有群众方法、群众路线，所以有很多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习仲勋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实现了立场和方法的统一。无论是在长葛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还是创建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这些功绩都包含了调查研究之深与为民情怀之真的统一、敢于担当之硬与实事求是之强的统一。纵览全书，习仲勋践行群众路线的高超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在每一篇访谈中都有所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是一本群众路线方法论的经典教程，值得每一名共产党员用心研读。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让我们在"没有文学化创作"的访谈之中，仰望到了一个以民为天，在群众心中留下不朽丰碑的习仲勋。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昂扬奋进，习仲勋宝贵的政治遗产，也必将助力我们早日梦圆！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办公室）

书评

四十年来家国

——读梁启超著《李鸿章传》

□王[illegible]言

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溘然长逝。"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李鸿章一生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天下鼎沸之际，急需一部[illegible]为其作盖棺论定。多种版本的《李鸿章传》应运而生，唯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独占鳌头，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成为日后《清史稿》中李鸿章传的重要来源。该书成功之处很多，主要是作者抓住了传主李鸿章的独特身份和传奇经历，能把传主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来观察，从而给其以人文关怀。作者从晚清中国政治与传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来破题开笔，"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四十年的中国风起云涌，皆与传主沉浮起落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所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因此，该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披阅全书，即阅尽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十年间中国政治风云，领略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风雨人生，更感悟到作者梁启超的天下家国情怀。

从传主逝去之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该书完稿之时（即作者于传前《序例》落款之时：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前后仅49天。作者是在世人对李鸿章的唾骂声中，顶着重重压力，仗义执言，秉笔直书。因为作者认为"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他之所以为李公作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对于世人所骂'丧权辱国'的罪名。梁启超在传中则以史实替传主澄清。如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李鸿章'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李鸿章遇刺之后，日本天皇和全日臣民，深感愧疚，"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画押"。作者在书中对此评述为'口舌所不能争者，藉一枪子之伤而得之"。就在遇刺的次日，有人看到沾满李鸿章鲜血的朝服，感叹道："以此血报国也！'朝廷得知李鸿章遇刺，就派其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意在代理主持马关和谈。而李鸿章仍'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就连为他治病的医生都看不下去。

作者在书中客观地记录了传主的病因、死亡的直接原因。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整两月，李鸿章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忧郁积劳，已乖常用度"。再则，"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加上连日来俄国公使为签订《中俄密约》对奄奄一息的李鸿章仍横加恫吓逼迫，当听到徐寿朋（外务部左侍郎，李的议和助手）死讯，"遂以大渐"。可恨的是李公弥留之际——逝世前一小时，"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如此种种终致李公'遂瞑焉长逝"。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满洲贵族，随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后因贻误回銮被斩）误国至此！"又长吁："两宫不肯回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从此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传主当时身心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残酷折磨。

书中，还从细节之中讲述，传主励精图治"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雷厉风行"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日五点即起，每晨必临《兰亭》百字的良好习惯，以及视洋人为市侩，"尤轻侮之"等细节皆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记录李鸿章出将入相，叱咤风云，突破了中国传统人物传记流行记事的套路，不加论赞，而是大胆借鉴西方，立体展示其文治武功、内政外交、得意失意、功誉谤过、显赫投闲等多个层面。"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人读之知其为人。"在传中，作者特意把传主纳入历史时空中与历代同类人物、东西列强将相、师友同僚、敌人对手，皆逐一相比对得失，甚至用太后和皇帝对其评价，全方位、多角度、跨时空讲述一个真实的李鸿章。

醒世警句，金玉良言，书中比比皆是。"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书中引用西方报纸评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大变动。'梁启超感叹："今日朝廷二品以上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敢断言也。"

在李鸿章代清政府签订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墨迹未干，全国一片唾骂"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之时，却是由梁启超来为其立传，真是出人意料。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审读任公（梁启超）毕生严谨为学治史，和他博大的天下家国胸怀，这又在情理之中。就连作者自己也认为此举是"取祸梨枣"，但作者更自信"合肥（李鸿章）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传主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者梁启超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李鸿章的成就在于他的政治生涯，而梁启超的辉煌则在于他人生的传奇经历和天赋与才华。二者相差50岁，同世交际29年。以梁启超的人生经历阅历和对世事的敏锐洞察，评述了传主78年风雨人生。梁启超虽满腹经纶、博闻强记、才华出众，但终是一位旧中国传统文人，有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该书虽然充满了旧文人的悲天悯人和改良主义的人文关怀，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的基本态度。无论如何，传主李鸿章要对中国近代一步步走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作者对此却只字未提，相反通篇尽是为其开脱罪责之词。这是本书留给世人的最大缺憾。也正是因为这些不足，更能凸现出本书的残缺之美留给后人的无尽思考，也为后世史学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可能。

全民悦读西安阅读会走进社区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9月13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新园社区开展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朗诵活动，带给数百名社区群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欣赏会。这是该社区与"全民悦读'网络平台联手开展的'全民阅读工程'的一个缩影。